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21.02.002

政治学视域下的《实践论》新探

常利兵

(山西大学 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山西 太原 030006)

摘要:1937年7—8月,毛泽东应邀为抗大学员作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讲演的讲义——《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是在集中学习、钻研相关哲学论著基础上完成的。《实践论》作为讲义的一部分,是毛泽东从哲学上对中国革命进行反思和总结的重要文本,其政治意义更在于培养和造就革命干部的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工作作风。将这一经典文本放回到毛泽东当时所处的历史语境中,从“文本与历史”互构角度基于政治学视域重新解读《实践论》,有助于探究他在授课写作时的所思所想与自身所处时代之间的互动关系。

关键词:《实践论》;中国革命;哲学与政治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21)02-0010-11

引言

《实践论》是毛泽东在1937年7月为抗大学员讲授哲学课程时撰写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讲义基础上完成的一篇重要文献^①。关于《实践论》的现有研究,大多在哲学范畴内展开,兼及版本的考证。如许全兴认为,《实践论》和《矛盾论》(即“两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革命实践、中国传统哲学优秀成果三者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典范^②。雍涛指出,“两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具体化、民族化、通俗化的典范之作,“从深层次上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结合起来,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民族化和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化”^③。李维武也认为“两论”标志着毛泽东“实践论”哲学体系的创立和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④。版本方面的问题,许全兴对“讲授提纲”“两论”的修改以及与苏联30年代哲学、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等关系做了比较深入的

探讨^⑤。

从哲学范畴讨论《实践论》是必要的,但局限于此又容易遮蔽这一经典文本生成语境的复杂性。本文旨在在《实践论》的问题史架构中探究“文本与历史”的互构性问题。笔者希望从哲学与政治的交互历史语境中剖析这一文本及其针对性问题,而不是首先给它一个哲学式的框定。如果急于把它直接作为通常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或“毛泽东思想”的构成部分,就可能先入为主地以“哲学—思想”的系统性来裁剪“文本”,导致文本自身的问题史被简单化。《实践论》文本有其自身的生成过程,而“哲学—思想”的系统性往往是经后来的文本书写、修改、加工的综合过程确立的,这两者不能直接等同,应拉开彼此的界限、距离,这样更有助于阐发《实践论》的问题主旨与历史意涵。比如,毛泽东如何发现和把握问题,并通过授课、撰写文本的方式表达其敏锐的现

收稿日期:2020-09-20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17BZS118)

作者简介:常利兵(1976—),男,山西泽州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社会史研究。

①详见《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271—286页。

②许全兴:《〈实践论〉和〈矛盾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启示》,《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12期。

③雍涛:《〈实践论〉、〈矛盾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哲学研究》2007年第7期。

④李维武:《毛泽东“实践论”的创立与20世纪上半叶中国认识论的开展》,《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

⑤许全兴:《有关〈实践论〉〈矛盾论〉文本研究的若干问题》,《毛泽东研究》2020年第4期。

实感的?或者说,他是如何意识和把握中国革命的现实境况的?又如何借助于“文本与历史”的交互作用来构想和型塑革命实践本身的?在毛泽东对革命实践的不断反思与构想中,他试图抓住现实中对革命有利的种种可能性,并克服那些不利的因素。这些都是他在抗大讲授提纲和撰写《实践论》时的思考所在。

本文对《实践论》的再解读主要从历史的内在视野审视和剖析它,把它看作是对中国革命实践展开的现实境况的一个认识、体察和把握。毛泽东的《实践论》写作和话语表达既是要抓住现实中的种种可能性,同时又不得不努力去应对现实给中国革命所带来的诸多限制和挑战。《实践论》在本质上就是一个“面对实际处境的文本”,承载着革命进程中变动不居的契机与难题,如果只是在“哲学—思想”的系统化脉络中进行讨论,显然是不够的。事实上,“讲授提纲”和《实践论》含有的政治论述和历史意涵已超出了哲学范畴的认识论意义,更在于培养和造就革命队伍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工作作风。因此,笔者试图把这一经典文本放回到毛泽东当时所处的历史语境中,从“文本与历史”的互构角度探究他在授课写作时的所思所想与自身所处时代之间的互动关系。

一 “革命的熔炉”——从抗大谈起

讨论《实践论》的问题史,除了它本身的问题构成外,抗大这一学校组织实体也是不可或缺的场域。抗大的创办、性质、目的、教学、课程、教员、学员、管理等方面互相交织和影响,在革命战争形势的激荡多变中型构出一种总体性的现实状况,进而对毛泽东的课程讲授提纲及其他教员学员形成了种种预期和规定。

时任抗大教育长的罗瑞卿在谈及抗大创办时指出:“中国共产党为着把自己全部政策的转变贯彻于党的全体干部中,为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迅速形成,以争取直接对日作战……因此,重新教育干部,把干部提高一步的问题……‘抗大’也

就在适应这种客观情况的需要而产生了。”^①可见,抗大主要是培养革命干部,以贯彻党的政策,担负起“应有的责任”。至于抗大的性质和办学特点,罗瑞卿认为,“一定的时期内政治教育的重要,较之军事教育更为迫切”,不仅是培养军事干部,而且“要培养出经过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了头脑,而又能够最好的掌握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军事干部”^②。很显然,创办抗大是抗日战争形势的需要,中共尤为突出政治教育对于培养干部的重要性,而毛泽东的“讲授提纲”就与抗大的教学指向直接关联。

罗瑞卿对抗大第二期的情况说明有助于理解抗大的政治教育及其规定的重要性。在学校发展中除了“教育上的设备、校具、教育用品、教材以及军事、政治教员等更感无法应付”等不少困难外,还有许多新的困难。如“学生之程度的不一致,如何来巩固外来学生与军队干部之间的团结问题,特别是经费困难得不可终日状态”^③。针对各地不断有青年学生奔赴延安,加入抗大,中共对他们进行“抗日战争的理论与方法”“创造抗日干部的事业”等“国防教育”时,面临着如何处理外来学生与军队干部关系的新问题。罗瑞卿认为:“对于那几百个外来学生……经过几个月后,原来思想不健康的,工作上的不紧张,生活上的不能刻苦等等小资产阶级的习气,后来也能够逐渐转变过来了。不仅使他们政治上、军事上获得了应有的进步,就是思想意识上、生活习惯上那种小资产阶级的某些弱点,也帮助他们来了一个洗涤和克服。”^④

抗大从“政治军事”“思想意识”“生活习惯”等方面对外来青年学生的“小资产阶级习气”进行“洗涤”和“克服”,以打造学生与干部之间“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风,成为抗大教育中的重要内容。何长工在回忆抗大岁月时,将它视为“革命的熔炉”,除了培养训练红军干部之外,还要对延安的外来知识青年进行培养和塑造。“抗大第二期是最关键的一期。毛泽东同志参加

①罗瑞卿:《“抗大”的过去与现在》,《解放》1938年第48期。

②罗瑞卿:《“抗大”的过去与现在》,《解放》1938年第48期。

③罗瑞卿:《“抗大”的过去与现在》,《解放》1938年第48期。

④罗瑞卿:《“抗大”的过去与现在》,《解放》1938年第48期。

了开学典礼,并作了重要讲话。他说:‘抗大是一块磨刀石,把那些小资产阶级的意识……磨它个精光;把自己变成一把雪亮的利刃,去革新社会,去打倒日本。’特别有意义的是毛泽东同志第一次提出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作为抗大的教育方针。”^①毛泽东作为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将抗大形容为“一块磨刀石”,就是要将“小资产阶级的意识”种种表现打磨掉,要学习“朱总司令:度量大量如海,意志坚如钢”^②。这对抗大教育提出了明确的政治方向 and 规定性。《实践论》本质上就是毛泽东以哲学的方式思考和解决他身处革命环境中的一系列政治问题,而“人的因素”又是最关键的,即“创造抗日干部的事业”成为革命工作的重中之重。毛泽东在抗战初就强调“政治路线确定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③。抗大作为培养军事和政治干部的学校,以什么样的教学方式培养和训练干部,这对于干部教员尤其是那些带有“小资产阶级”气息的外来学生,提出了比较高的政治规定。

毛泽东在抗大讲课的具体细节,据《毛泽东年谱》记载:“写作讲授提纲经过了近一年时间的准备和酝酿……所写几万字的读哲学书的批注,形成了讲授提纲中一些论点的雏形。讲授提纲密切联系中国革命实际,以通俗易懂的语言,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些基本内容。”^④现在学界多从哲学层面对《实践论》进行研究,强调它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贡献,也许是受毛泽东年谱的影响。如“讲授提纲密切联系中国革命实际,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些基本内容”的提法,更容易使人们只注重其哲学意义的呈现,疏忽其政治意义的发掘。年谱中还指出,毛泽东的讲课时间是“每星期二、四上午授课,每次讲四个小时,下午还参加学员讨论,共授

课一百一十多小时,历时三个多月”^⑤。关于授课时间,何长工也有记述:“1937年,毛泽东同志……还抽出时间为抗大学员讲授《实践论》和《矛盾论》。从四月份一直讲到‘七七事变’,共讲了一百多个小时,从而使学员懂得了必须掌握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努力克服教条主义的重大意义。”^⑥何长工将毛泽东的讲课内容直接归结为“两论”是不准确的。尽管“两论”是“讲授提纲”中两个重要部分,但他显然是用经典化后的“两论”概括整个讲授课程了。

前文指出,对《实践论》的讨论,首先要放在抗大这一历史语境中,而抗大的创办又直接回着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任务,以及中央苏区的革命经验和教训。这些也是毛泽东到达延安后及时地反思和总结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制订抗日战争策略等问题时必须面对的现实处境。郭化若在《学习与回顾》中写道:“有一次我在毛主席办公室内,看到桌面上放着一本《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开头和其他空白处都有墨笔小字的旁批,内容全是中国革命中路线斗争的经验教训。这使我初步理解到毛主席是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中国的实际问题,并把中国革命的实际经验提高到理论水平上来。他这些旁批,后来就逐步发展成为他的光辉著作《实践论》。”^⑦在《毛泽东传》中也记录了毛泽东在抗大授课时的情况。1937年7—8月,应抗大的请求,毛泽东“向学员讲授唯物论和辩证法”,“总政治部把他讲课的记录稿整理出来,经他同意,打印了若干份”,“毛泽东把其中的两节,经过整理,成为收入《毛泽东选集》中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并指出:“这是他对中国革命经验所作的一次更深刻、更系统的哲学总结,是他把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成果,也是对曾经长期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的看轻

①何长工:《难忘的岁月》,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56页。

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59页。

③毛泽东:《论新阶段(1938年10月12—14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43页。

④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71页。

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72页。

⑥何长工:《难忘的岁月》,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59页。

⑦郭化若:《学习与回顾》,军事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01页。

实践的教条主义这些主观主义思想的有力批判。”^①无论是郭化若的亲眼所见,还是《毛泽东传》中的叙述,不仅强调了从讲授提纲到《实践论》有一个生成过程,而且毛是以哲学的方式来总结革命实践经验,为批判党内教条主义、主观主义的错误思想奠定了政治基础。

针对毛泽东在抗大的授课情况,肖特也指出,1937年8月“系列课程突然被打断了,此时日本对上海的进犯迫使毛将注意力转移到更直接更实际的题目上去”,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将哲学抛在一边”。“对于毛来说,哲学实际上是一根魔术棒,或者说进入思想领域内的一块跳板,而不是在于它本身的内在魅力。在建立他的作为一位理论家的资历方面,和在加强他对党的领导权方面,《实践论》和《矛盾论》是很重要的,而他只是发现写起来太辛苦了点。……纯理论只是达到某一目的的手段,不是毛从中获趣的一个题目。”^②肖特虽强调了哲学及对“两论”文本的影响,但相对于毛泽东的“理论家的资历”和“对党的领导权”来说,哲学更像是“一根魔术棒”或“一块跳板”,“只是达到某一目的的手段”。肖特的论述反映了在对待毛泽东阅读哲学著作及在讲授提纲基础上完成的《实践论》时,不能一概回收在“哲学的用途”上进行讨论,更需探究的是他如何借助于哲学这个跳板在政治诉求上不断打开中国共产党人“革新社会”和“改造世界”的种种可能。

1965年1月9日,在回答斯诺提出的“《矛盾论》是不是对马列主义作出了新的贡献?是不是真的在1937年写的?”问题时,毛泽东说:“是1937年写的。当时大家都走了,去打日本了。那时抗日军政大学要我去讲一讲哲学,我没有办法,花了几个星期,搜集了些材料,主要是总结中国的经验……其实,《矛盾论》不如《实践论》那篇文章好。《实践论》是讲认识过程,说明人的认识是从什么地方来,又向什么地方去。”^③在此有两点须加注意:一是毛泽东在抗大讲哲学“主要是总结

中国的经验”,那么对其讲授提纲和“两论”进行研究时就需从哲学与中国经验的关系中展开,他如何以哲学的方式总结革命经验,并试图对抗大干部学员形成影响?二是毛泽东认为《实践论》比《矛盾论》好,旨在强调由《实践论》文本所生发出来的有助于培养和塑造革命干部理论联系实际的工作作风的政治意义。

二 《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④: 文本构成及话语表达

接下来,本文通过考察毛泽东“讲授提纲”的文本构成及意涵,对他在讲授课程中的话语表达与问题指向做进一步的了解和把握。

首先是讲义文本的构成情况。讲授提纲中共有“三章十六节”:第一章“唯心论与唯物论”,包含“(一)哲学中的两军对战”“(二)唯心论与唯物论的区别”“(三)唯心论发生与发展的根源”“(四)唯物论发生与发展的根源”共四节内容;第二章“辩证法唯物论”,包含“(一)辩证法唯物论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武器”“(二)旧的哲学遗产同辩证法唯物论的关系”“(三)辩证法唯物论宇宙观和方法论的一致性”“(四)唯物辩证法的对象问题——唯物辩证法是研究什么的?”“(五)物质论”“(六)运动论(发展论)”“(七)时空论”“(八)意识论”“(九)反映论”“(十)真理论”“(十一)实践论”共十一节内容;第三章“唯物辩证法”,包含“矛盾统一法则”一节内容,又具体分了“(一)两种发展观(二)形式论理学的同一律与辩证法的矛盾律(三)矛盾的普遍性(四)矛盾的特殊性(五)主要的矛盾与主要的矛盾方面(六)矛盾的同—性与斗争性(七)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七小节内容。就各章节而言,第一章四节所占比例最小,第二章十一节和第三章一节所占比例相差无几,各自占了整个讲义近一半的篇幅。从讲义撰写的完整性看,第一章和第二章相对成型、完整,而第三章拟定要“分述辩证法”的“矛盾

①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510页。

②肖特:《毛泽东传》,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年版,第292页。

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66页。

④笔者搜集到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为横排繁体字单行本,共93页,版权页缺失。由该文本结尾处的“论矛盾统一律完。1937.8.7”字样和其他版本比对、推断,应是1957年左右根据早期版本重新编排印刷的内部资料。

统一法则”“质量互变法则”和“否定之否定法则”三个法则,结果仅完成第一个法则,并在讲义结尾处写有“论矛盾统一律完。1937.8.7”的字样。

在讲授提纲中,毛泽东的话语表达具有书面语和口语相结合的特点,其中书面语多用于哲学认识论的阐发和解释,口语在讲义例证中使用较多。从书面语的字里行间可以发现毛泽东对相关哲学著作内容的转述、引用的痕迹^①,并以自己的话语对所引哲学原理进行加工、创造。例如,讲义中第一章“唯心论与唯物论”相对于其他章节,主要是一种“二元对立”哲学观的总论性呈现。“唯心论和唯物论学说都是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而存在……哲学中的某一倾向,不管哲学者自身意识到与否,结局总是被他们所属阶级的政治方向所左右的。哲学上的任何倾向,总是直接间接助长着他们所属阶级的根本的政治厉害。”^②毛泽东从相互对立的意义上将唯心论与唯物论视作是“哲学中的两军对战”,认为哲学观总是由一定阶级的“政治方向”和“政治厉害”所决定。这说明他对哲学的讲解并不是纯粹哲学意义上的讨论,而是在哲学与政治的关系中展开。

由此,才能明白毛泽东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法唯物论的特征”的话语表达意涵。即“……在中国目前阶段上,哲学的任务,是从属于推翻帝国主义与半封建制度、彻底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并准备转变到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社会去的一般任务之下,哲学的理论与政治的实践是应该密切联系着的”^③。毛泽东强调了抗战时期“哲学的任务”“哲学的理论”是从属于历史“形势”与“任务”规定下的“政治的实践”的。他之所以对哲学作如此的认识和把握,一方面是当时哲学论战思潮的影响,另一方面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革命经验与教训。毛泽东虽没有直接参与哲学论战,但这一思潮无疑对他如何以自己的方式理解哲学起了知识上的促进作用;中央苏区革命的曲折展开也使得毛泽东坚信

哲学的效用不仅在于改变人的“主观世界”,更在于改变“客观世界”。现有研究直接将《实践论》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产物,反而对哲学与政治的相互关系鲜有关注。这可能是研究者受到《毛泽东年谱》中相关文字记述影响的结果。年谱中记载:“《实践论》是为着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观点去揭露中国共产党内的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错误而写的。文章从哲学的高度,指出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本质,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④但在毛泽东的讲授提纲中并没有出现“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概念,年谱中为何会用这样的概念并将其看作是《实践论》话语表达中“哲学的高度”的根据呢?

通过文献比对发现,毛泽东年谱中这些概念化表述主要来源于1950年代初《毛泽东选集》重新修订出版收入《实践论》一文时所做的“题解”文字说明。“……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是为着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观点去揭露党内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这些主观主义的错误而写的。因为重点是揭露看轻实践的教条主义这种主观主义,故题为‘实践论’。”^⑤这一题解文字将毛的“实践论”现实针对性概括为中国革命中表现出来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两个方面。笔者并不是否定此题解对于研究《实践论》的重要性,而是除了以这则后来编写的题解作为必要参照外,也要重视对讲授提纲本身的研究。1951年《人民日报》发表《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社论文章,李达撰写的《〈实践论〉解说》等,已经是以更加系统化的意识形态话语叙说《实践论》文本的意义和地位了。如:“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在哲学阵线上进行了反对主观主义两种流派的斗争,即反对教条主义和反对经验主义。”^⑥李达也指出,《实践论》“就是要提高党的理论水平,使党员能够运用马克思列宁主

①许全兴在《有关〈实践论〉〈矛盾论〉文本研究的若干问题》一文中对此有详细的讨论。

②毛泽东:《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第1—2页。

③毛泽东:《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第2页。

④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7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272页。

⑥《学习毛泽东同志〈实践论〉》,《人民日报》1951年1月29日第1版。

义的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而它本身也正是“在反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反‘左’右倾机会主义的两条战线的斗争中锻炼出来的”^①。这些更为成型的《实践论》话语表达,在一定程度上已超越了毛泽东的“抗大”讲授提纲的原有意涵。

再回到讲授提纲本身的问题上来。毛泽东在第一章的讲授内容中强调的是要树立一种正确的“唯物论”哲学观,以“彻底地克服唯心论”。他指出:“人类在社会生活中,人同人之间相互发生关系与影响,在阶级社会中并且实行着阶级斗争。被压迫阶级考虑形势,估计力量,建立计划,在他们的斗争成功时,使他们确信自己的见解并不是幻想的产物,而是客观上存在着的物质世界的反映。”^②毛泽东用浅显明了的口语化例证试图说明要想在阶级斗争中取得胜利,就要使主观的计划符合对客观世界的正确认识。这在第二章第十一节“实践论”中更加具体化了。“不管是生产行动也罢,阶级斗争或民族斗争的行动也罢,其它任何一种行动也罢,都是受着思想(知识)的指挥的。马克思主义所以称为科学的革命知识,就是因为它正确地反映了客观世界的实际规律,它是客观的真理。”^③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讲授与他对革命实践经验的反复思考及如何正确有效地将中国革命引向胜利的现实期待紧密相关。这与那些仅从形而上的角度抽象地谈论哲学的做法是根本不同的。

在讲义第二章“辩证法唯物论”中,“实践论”是讲授十一个小节问题中的最后一个。这一讲内容最早在1938年《抗战大学》公开发表^④,之后各地有印刷发行的《实践论》单行本^⑤。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号召学习“实践论”的舆论宣传同时,重新编修《毛泽东选集》时将《实践论》收入其中,至

此,《实践论》文本的“经典化”地位得以确立。学界对这一文本讨论多是根据它的“经典化”状态展开,很少对原初的讲授提纲文本构成关系及历史指向进行研究。“实践论”在内容上固然重要,毛泽东为何在最后一节讲授,此节与其他各节之间又存在怎样的文本关联性?其实毛泽东对各节内容的安排有一定的逻辑关系思考。第一、二节首先是从哲学与政治的关系上对辩证法唯物论做了说明,第三至十节分别从不同角度讲授了辩证法唯物论的主要哲学观点,最后才对“实践论”展开讨论。这体现了一个“总—分—总”的文本构造关系。在本章开始,毛泽东强调说:“如果辩证法唯物论……被中国无产阶级、共产党及一切愿意站在无产阶级立场的广大革命分子所掌握,他们就能够正确地理解革命运动的发展变化,提出革命的任务,团结自己和同盟者的队伍,战胜反动的理论,采取正确的行动,避免工作的错误,达到解放中国与改造中国的目的。”^⑥但在具体行动中,“因为主观主义与机械论这两种错误的理论与工作方法,常常在干部人员中间存在着”,所以又会“常常引导干部人员违反马克思主义,在革命运动中走入歧途”。而要“避免与纠正这种缺点”,只有“自觉地研究与了解辩证法唯物论,把自己的头脑重新武装起来”^⑦。毛泽东不仅对辩证法唯物论的哲学观给出了“总”的定位和讲解,而且其阐述又与当时中国政治演进的历史状况相关联。“到了最近,由于民族危机与社会危机的严重性,也由于苏联哲学清算运动的影响,在中国思想界发展了一个广大的唯物辩证法运动。它将以横扫的阵势树立自己的权威,指导中国革命运动,勇往迈进,定下中国无产阶级领导中国革命进入胜利之途的基础。”^⑧这一“总”的认识对于抗大

^①李达:《怎样学习〈实践论〉》(1951.6),《新建设》1951年第4卷第4期。转引自李达著《〈实践论〉〈矛盾论〉解说》,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226页。

^②毛泽东:《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第6页。

^③毛泽东:《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第31页。

^④1938年第1卷第6期《抗战大学》在“新哲学讲座”栏目中正式发表“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第一章,并署名“毛泽东主讲”。同年第7期又发表了“辩证法唯物论(二)”第二章,署名“毛泽东”。

^⑤奚景鹏:《关于毛泽东〈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早期版本》,《党的文献》2007年第4期。

^⑥毛泽东:《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第9页。

^⑦毛泽东:《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第9页。

^⑧毛泽东:《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第10页。

干部学员将哲学理解内化为革命政治行动的一种“精神武器”无疑是非常必要的。当然强调这一“总”的哲学定位是一回事,如何把它从学理层面变得问题化、具体化,则是另一回事。毛泽东在讲义中主要以“分”而述之的方式进行。

在讲授辩证法唯物论的第一基本原则“物质论”时,毛泽东指出,承认物质对于意识的根源性是以世界的物质性及其客观存在为前提的,即“物质世界离人的意识而独立存在”。毛泽东以革命实践的亲身经历解释说:“经过了万里长征的红军,不怀疑经过地区连同长江大河雪山草地以及和它作战的敌军等等的客观存在,也不怀疑红军自己的客观存在,中国人不怀疑侵略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同中国人自己的客观存在,抗日军政大学的学生也不怀疑这个大学和学生自己的客观存在。”^①这些离开人的意识而独立存在的东西就是唯物论“哲学的物质观”的体现。毛在讲义中还对“运动论”原则做了详细讲述。“承认运动是物质存在的形式,是物质内在的属性,是物质多样性的表现,这就是世界的发展原理”,并批判“离物质而思考运动”的“哲学的唯心论”“宗教的神道主义”“机械唯物论”,及“离开运动而思考物质”的“形而上学的宇宙不动论或绝对均衡论”^②,以强调“辩证法唯物论的世界运动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精髓的重要性。此外,他还指出“封建地主阶级……一切的反动势力,他们的哲学都是不动论”,而“革命的阶级同民众,却眼睛看到了世界的发展原理,因而主张改造这个社会及世界”^③。毛泽东认为,如果无产阶级及一切革命的人们拿着“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与方法论”这个“彻底科学的武器”,那“他们就能够理解这个世界并改造这个世界”^④。由“物质论”和“运动论”的例证可见毛泽东讲授哲学原理的鲜明政治指向。

“实践论”这一节的讲授是在第一、二节(“总”)和第三至十节(“分”)的基础上,再以

“总”的方式展开的。毛泽东在“实践论”的讲解中将辩证法唯物论原理的阐释、分析与具体经验案例的总结、反思多有结合,特别是对哲学与政治相互关系的构造与呈现也更加充实、具体。但是,因“实践论”文本“经典化”地位的确立和影响,它在讲义中的文本结构关系反而被忽视了。实际上毛在“实践论”之前对相关哲学原理的讲授为理解和把握“认识与实践”“理论与实际”“知与行”的关系问题奠定了知识基础。即他有意识地将“物质”“运动”“意识”等抽象的哲学概念融入更容易感知和践行的“实践论”当中。

从讲授提纲的文本结构和话语表达来看,第三章“唯物辩证法”的重要性并不亚于第二章。由第三章序言可知,毛泽东原计划讲“矛盾统一法则”“质量互变法则”和“否定之否定法则”,但只完成了“矛盾统一法则”的撰写和讲解。在强调为何要学习辩证法时,毛泽东指出:“不为别的,单单为了要改造这个世界,要改造这个世界上面人与人、人与物的老关系。在我们中国这个地方生活着的人类,受着惨无人道的双重性制度的压迫——民族压迫与社会压迫,我们必须改变这些老关系,争取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⑤在毛泽东看来,学哲学的目的就是要改造现实世界。同时,要把辩证法讲解得通俗易懂,不至于“使人望而生畏”,就要有“善于讲解辩证法”的好书,这暗含了他讲授中的通俗化特征。在讲到事物内外因的辩证关系时,毛泽东既阐述“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的原理,又用事例说明:“鸡蛋因得适当温度而变化为鸡子,但温度不能使石头变为鸡子,因为内的根据不同。1927年资产阶级战败了无产阶级,是通过无产阶级内部的(共产党内部的)机会主义而起作用的。”^⑥看似抽象的哲理,经过毛泽东的讲授彰显了更具紧迫性和现实性的政治需求。因此“所谓善于讲解的书,在于以通俗的言

①毛泽东:《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第16页。

②毛泽东:《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第19—20页。

③毛泽东:《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第20—21页。

④毛泽东:《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第24页。

⑤毛泽东:《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第52页。

⑥毛泽东:《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第58页。

语,讲亲切的经验”^①。总之,这些文本层面的发掘与剖析对于从历史内在理路来把握“实践论”的历史意涵就显得极为重要了。

三 重读“实践论”:中国革命实践中的哲学与政治

在“实践论”讲义部分,毛泽东首先对认识与实践的关系做了阐释。“人的认识,主要的依赖物质的生产活动,逐渐了解自然的现象、自然的性质、人与人的关系;而且经过生产活动,同时也认识了人与人的相互关系”,但是“人的认识,在物质生活以外,还从政治文化生活中了解了人与人的各种复杂的关系。其中尤以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给予人的认识发展以深刻的影响”^②。这是从哲学层面强调人的认识来自社会实践的重要性。毛泽东还认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衡量人们对于外界认识正确与否的“真理性标准”。“农民如果得不到收获,工人如果做不成器物,罢工斗争,军队作战,民族革命,如果也都得不到胜利”,那是“因为人们的认识没有外界的过程的实况去反映这些过程的规律性,因而在他们的实践活动中不能达到预想的结果”^③。毛泽东在讲授“实践论”时,反复阐释了人的认识依赖于实践的哲学观,并强调它最显著特点在于,一是“它的阶级性”,即“公然为无产阶级服务”,另一是“它的实践性”,即“理论来源于实践,又反过来为实践服务”^④。所以,要把握毛泽东从“认识与实践”的关系角度阐发他对“实践论”的讲解,就需对其内含的“哲学与政治”诉求加以剖析和理解。不只要看毛泽东对“实践论”的哲理性强调,也要看他是如何具体讲述的,期望在学员干部身上达到怎样的学习效果。

概言之,毛泽东从三个层面讲授“认识与实践”的关系,分别是认识的第一个阶段——“感性”阶段是认识的第二个阶段——“论理”阶段,即“理性”阶段是第三个阶段是由“理性的认识”

再回到社会实践中去,即“应用理论于实际”的阶段。由此,毛泽东将辩证法唯物论中的“理”与中国革命实践中的“事”有效融合,通过丰富的“事”“理”讲解,让抗大学员懂得“人的认识究竟怎样从实践发生,而又服务于实践”的问题,体现了“学以致用”的目的。所以毛泽东对“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与基本的观点”的自我理解,旨在期望学员内化为一种有效的工作方法,运用到革命实践中去。

毛泽东在讲解认识的第一个阶段时指出,人们在实践过程中一开始只是看到各个事物的“现象”“片面”“外部联系”,并以“国民党考察团到延安”为例进行解释。这样的例证本身就是值得注意的历史细节,它是毛泽东在国共两党如何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御敌问题上所持政治立场的期待和表现。“国民党考察团到延安的头一两天,看到了延安的地形、街道、屋宇,接触了许多的人,参加了宴会、晚会与群众大会,听到了各种说话,看到了各种文件,这些就是事物的现象,事物的各个片面以及这些事物的外部联系”。这就是认识的“感性阶段”,也就是“延安这些各别的事物作用于考察团先生们的感官,引起了他们的感觉,在他们的脑子里生起了许多的印象,以及这些印象间的大概的外部的联系”^⑤。但是在认识的第一个阶段中,人们还不能“造成深刻的概念”,“作出理论的结论”。这就涉及如何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第二个阶段,即要经历一个“概念—判断—推理”的思维过程。概念的产生依赖于社会实践中那些引起人们“感觉与印象的东西”反复多次后出现的认识突变过程,它凸显了事物的“本质”“全体”和“内部联系”。为使学员明了何为“判断与推理”,毛泽东用“眉头一皱计上心来”“让我想一想”的俗语作比喻,讲解运用概念以作判断与推理的问题。“考察团先生们在他们集合了各种材料,加上他们‘想了一想’

①毛泽东:《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第54页。

②毛泽东:《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第34—35页。

③毛泽东:《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第35页。

④毛泽东:《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第35页。

⑤毛泽东:《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第36页。

之后,他们就能够作出‘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国共合作的政策是彻底的、诚恳的与真实的’这样一个判断了。”而且“在他们作出这个判断之后,如果他们对于团结救国也是真实的话,那末他们就能够进一步作出这样的结论:‘国共合作是能够成功的’”^①。毛泽东认为,这个含概念、判断与推理的理性认识阶段是“人对于一个事物的整个认识过程中的最重要的一个阶段”。因为理性的认识“到达了事物之全体的、本质的、内部联系的东西,因而能在周围世界之总体上,在周围世界一切方面之内部联系上,去把握周围世界的发展”^②。通过讲授认识的第一、二阶段,毛泽东阐述了他对认识发展过程的哲学理解,并以事例说明掌握认识与实践的辩证关系对于开展革命政治工作的决定性作用。

毛泽东通过考察认识如何从实践中发生、如何依赖于实践,以及认识与实践的辩证关系等问题,根本上还是在强调实践的重要性。“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解才解决本质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无论何人要认识什么事物,除了同那个事物接触,即生活于(实践于)那个事物的环境中,是没有法子解决的”^③。而且,毛泽东对实践概念的讲解也有丰富的经验性表达:“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你要知道原子的组织同质性,你就得实行化学家的实验,变革原子的情况。你要知道革命的具体理论与方法,你就得参加革命。”^④所以,离开实践的认识和知识是不可能的,即凸显了实践第一的原则。毛泽东对认识与实践的辩证关系的通俗解释,更在于引导学员干部能积极投身到社会实践中,获得符合客观实际的认识。而学员所面临最紧迫的实践就是抗日救国,这也是当时的最大政治。毛泽东在讲授哲学时也不可能脱

离开现实政治的规定性来强调实践的重要性。在以战争为例讲述实践的的决定性作用时,毛指出那些没有战争经验的领导者“在开始阶段只是身历了许多作战的经验,而且败仗是很多的”,然而正是“胜仗,特别是败仗的经验”使他们能够“懂得”和“理会”整个战争的规律性、战略与战术,从而有把握地指导战争^⑤。这虽呈现了“实践论”中“认识与实践”辩证关系的重要性,但毛泽东又强调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性“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宇宙”,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改造宇宙”^⑥。

所以,毛泽东在讲解认识的第三个阶段即由理性认识回到实践中的问题时强调:“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于从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之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还须表现于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这一个飞跃。”^⑦这一哲学解释体现了毛泽东试图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武装学员干部头脑的用心,而问题更在于如何将所学知识转化到学员的观念和行动中去。当人们掌握了世界现实规律性的认识后,“必须把它再用到改造世界的实践中去,再用到生产的实践、革命的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的实践以及科学实验的实践中去”^⑧。这恰是由认识的第二个阶段到第三个阶段后进一步把握认识与实践关系的关键,也是毛对“实践是真理的标准”这一抽象哲学原理的具体化表达。

毛泽东还以具体的认识运动为例进行示范性阐述,呈现了“实践论”中哲学与政治的深层意涵。如:“……由于客观过程的反映与主观能动性的作用,使得人的认识由感性的推移到了理性的,造成了大体上相应于该客观过程之法则性的理论、思想、计划、或方案,然后再用这种理论、思想、计划或方案于该同一客观过程的实践,如果能

①毛泽东:《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第36—37页。

②毛泽东:《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第37页。

③毛泽东:《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第38页。

④毛泽东:《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第39页。

⑤毛泽东:《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第40页。

⑥毛泽东:《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第43页。

⑦毛泽东:《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第43页。

⑧毛泽东:《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第43页。

够实现预想的目的……那末,对于这一具体过程的认识运动算是完成了。”^①从理想状态看,这一认识运动原理的方法论意义对于身处实际工作中的人而言是重要的。但在变革现实的实践中,“人们原定的理论、思想、计划、方案,毫无改变地实现出来之事,是很少的”,因为从事变革现实的人们不但受着“科学条件与技术条件”的限制,也受着“客观过程表现程度”的限制。所以,在实践中因“发现前所未料的情况”,部分或全部地改变“理论、思想、计划、方案”的事是常有的,甚至“须反复失败过多次,才能纠正错误的认识,到达于同客观过程的规律性相符合”^②。通过讲述一次具体认识运动的完成过程,毛泽东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进行了解释和阐发,也是为学员开展革命工作提供切实可行的思路、方法。这在他结合中国革命经验与教训的讲授中体现得更明显:“所贵于革命的指导者,不但在于当自己的理论、思想、计划、方案有错误时须得善于加以改正,而且……要使新的革命任务与新的工作方案的提出,适合于新的情况的变化。革命时期情况的变化是很急速的,如果革命党人的认识不能随之而急速变化,就不能引导革命走向胜利。”^③毛泽东在此所讲的已超越了哲学意义上的知识讨论,重在强调革命领导者要能够根据革命形势的转移、变化及时地调整或改正“理论、思想、计划、方案”,否则革命就难以取得胜利。

毛泽东又指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应该利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紧密地依靠革命实践的基础,使自己的认识跟着客观情况的变化而变化,使理论的东西随历史的东西,平行并进,达到完满地改造世界的目的”^④。为此,他以“革命队伍中的顽固派”和“‘左’翼清谈主义”作为反面事例作了批判说明。前者表现为“右倾机会主义”,即“他们的思想不能随变化的客观情况

而前进”,如“中国 1927 年的陈独秀主义,苏联的布哈林主义”。“这些人看不出矛盾的斗争已将客观过程推向前进了,而他们的认识仍然停留在旧阶段。他们的思想离开了社会的实践”^⑤。后者如“中国 1930 年的李立三主义”“苏联的托洛斯基主义”。“他们的思想超过客观过程的一定发展阶段……离开了当前大多数人的实践,离开了当前的现实性,行动上表现为冒险主义。”^⑥毛泽东的这些话语是对中国革命经验与教训的哲学总结和反思,更是基于革命实践的政治规定性为中国革命能够取得胜利打造新的可能性。所以,当他最后强调“我们的结论是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知与行的具体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时,其政治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当然,毛泽东讲授“实践论”的现实指向和政治期许又建立在他身处的历史之上。1949 年初,他在与米高扬谈到中共早期历史时说:“那时以陈独秀为首的机会主义者掌握了领导权,这导致了这一时期中国革命的失败。”直到 1927 年 8 月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中国共产党才摆脱了这一机会主义的领导。而党内存在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给革命造成了更大的损失。“他们认为党的对内对外工作都是不正确的。1930 年李立三一直坚持这种观点。他们没有革命斗争和建设的实践经验。1931—1934 年党的领导权掌握在这些‘左’倾机会主义者手里。”^⑦所以,当毛泽东在抗大讲授哲学时已不只是学习哲学知识的问题,而是如何将有关革命经验与教训的反思、批判和总结与课程讲授计划融合在一起,以培养和塑造理论联系实际的革命干部队伍。

结语

胡乔木曾指出:“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矛

①毛泽东:《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第 44 页。

②毛泽东:《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第 45 页。

③毛泽东:《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第 45—46 页。

④毛泽东:《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第 46 页。

⑤毛泽东:《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第 46 页。

⑥毛泽东:《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第 46—47 页。

⑦《米高扬与毛泽东等人会谈纪要:中共历史问题(1949 年 2 月 3 日)》,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 1 卷)》,东方出版中心 2014 年版,第 411—412 页。

盾论》中的多数论点,是马恩列或三十年代苏联哲学界所已经提出过的,不能轻易说是他的创见。但毛泽东同志在哲学上确有非常重要的独到之处。”^①我们从哲学与政治的角度来重读“实践论”,旨在把这一经典文本放回到它所处的历史脉络中,考察《实践论》问题史生成中“文本与历史”相互构造的作用和影响,进而揭示毛泽东具有“非常重要的独到之处”的真正意涵恰恰在于他突破了哲学的界限,以型塑有利于中国革命的政治状况。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

上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须解决的问题。”^②与一年前的哲学讲授相比,毛泽东此时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问题,并认为只有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而毛泽东在讲授提纲及“实践论”部分的讲解、讨论中,已经是以哲学方式处理革命中的政治问题了。

A New Study on *On Practi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itical Science

CHANG Li-bing

(Research Center for Chinese Social History, Shanxi University, Taiyuan 030006, China)

Abstract: In July and August 1937, Mao Zedong was invited to give a philosophical lecture on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for the students of the Anti-Japanese Military and Political University. The handout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Teaching Outline) was completed on the basis of concentrated study and study of related philosophical works. As a part of the handout, *On Practice* is an important text of Mao Zedong's philosophical reflection and summary of Chinese revolution, but its political significance lies more in the work style of training and bringing up revolutionary cadres combining theory with practice. This classic text is put back in 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Mao Zedong, and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is explored between his thoughts in teaching and writing and his own contex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utual construction of text and history.

Key words: *On Practice*; Chinese revolutionary; philosophy and politics

(责任校对 游星雅)

^①《胡乔木传》编写组编:《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46—147页。

^②毛泽东:《论新阶段(1938年10月12—14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文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651页。